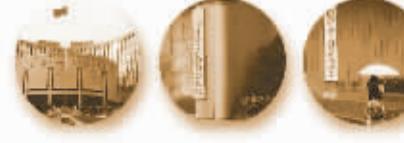




金融这五年



金融业 发展改革迈出新步伐

□本报记者 任晓 北京报道

过去的五年,是中国人民银行执行的货币政策发挥前所未有的五年,是各项基础性制度建设不断完善的五年,也是我国金融业蓬勃发展的五年。

汇率改革迈出历史性步伐

2005年7月21日19时,这个时刻注定被载入中国金融改革开放史册。因为自这一刻起,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同时,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国内外对此举好评如潮,认为这不仅体现了人民币汇率改革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原则,也表明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有文章指出,此次改革不仅标志着中国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迈出了历史性步伐,也体现了央行高超的调控艺术。

五年来,外汇市场供求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发挥,人民币汇率总体走高。汇改以来至2007年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13.31%,对欧元汇率累计贬值6.12%,对日元汇率累计升值14.04%。2007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幅度达5.13%,名义有效汇率升值

1.63%(均未经修正)。

央行也越来越重视汇率升值对抑制通胀的作用。在2007年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央行首次强调,“进一步发挥汇率在调节国际收支、引导结构调整和抑制价格上涨中的作用。”

汇率浮动区间进一步扩大。2007年5月21日,央行将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浮动幅度从0.3%扩大到0.5%。周小川曾表示,只要目前的汇率波幅用足,汇率浮动区间就会进一步扩大。

金融调控成效显现

五年来,央行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加强和改善金融调控。在央行的努力下,金融调控取得明显成效。2007年,针对银行体系流动性偏多、货币信贷扩张压力较大、价格涨幅上升的形势,货币政策逐步从“稳健”转为“从紧”。央行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采取综合措施,维护总量平衡——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在灵活开展公开市场操作的同时,十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共5.5个百分点,六次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

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建设稳步推进。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自2007年1月4日正式运行以来,在货币市场的基准利率地位初步

确立。Shibor报价的准确性、灵敏性、代表性稳步提高,与拆借、回购利率的利差稳定性不断增强,以Shibor为基准的市场交易持续扩大。同时,Shibor在市场化产品定价中得以广泛运用。

银行间债券市场迅猛发展

推动金融市场发展是央行的一项重要职能,也是改善金融调控的一个必要条件。五年来,中国金融市场建设取得重大进展,银行间债券市场更是得到了迅猛发展。据央行统计,2007年银行间市场债券回购累计成交44.8万亿元,日均成交1799亿元,同比增长69.8%;同业拆借累计成交10.7万亿元,日均成交428亿元,同比增长4倍,日均成交量创历史新高。

银行间债券市场在产品创新上取得了重要突破。2005年12月15日,首期开元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和建元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成功发行,中国的资产证券化终于从理论走向了实践。同年,央行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推出了债券远期交易,金融衍生产品从此实现了零的突破。作为最基础的金融衍生工具,债券远期交易具有规避风险和发现价格的功能,对完善我国金融市场产品结构、促进银行间债券市场乃至整个金融市场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周小川“人民币先生”



□本报记者 任晓 北京报道

汇改大幕的勇气和远见而折服。

他,就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

1985年,周小川获得清华大学经济系统工程专业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是《国民经济模型与经济大系统的分解途径》。那时,他的研究涉及经济体制、宏观经济和金融等多个领域,为以后的经济管理工作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经济学家吴敬琏这样评价:

“1979年至1980年,周小川曾构造了一个多部门动态发展的社会经济仿真模型,并用于政策分析。周小川的结构分析一开始就突破了单纯物质生产领域的传统框架。他的这项工作及事后产生的论文,至今对学术界仍有启发。”

1986年,周小川进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这个机构隶属于国务院体改委,是当时中国市场改革的筹划部门,主要由青年学者构成,成员

包括王岐山和郭树清等人,被认为是当时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高地,周小川也因此成为市场经济的研究者和推动者之一。

1995年到2007年,周小川历任国家外汇局局长、建行行长、证监会主席和央行行长。他全面推进了规范证券市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利率市

场化和人民币汇率改革等一系列重磅市场化改革,不断将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推上新的台阶。

2007年,央行史无前例地6次动用加息工具。在治理流动性过剩时,周小川更是一个“斗士”:从年初到年末,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共5.5个百分点,这是一年前任何专家都没有预测到的。货币掉期、定向央票、特别国债、特种存款也成为他手中的“武器”。

在西方媒体看来,周小川是一个“杰出的技术官员”、“格林斯潘效仿者”。这位具有学院派气质且英文流利的行长,与其说是一名金融领导,不如说是一位经济学家和改革者。

2002年底至今,周小川任央行行长已有五年时间。五年来,中国GDP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周小川以其精湛的调控艺术为这一黄金增长提供了良好的金融环境。

有评论认为,周小川主导的渐进式汇率改革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内因。在国际压力下,央行始终坚持币值稳定,实行灵活的汇率,保持本国货币兑换上的信心。周小川因此被业界称为“人民币先生”,并被英国《银行家》杂志评选为2006年年度“最佳亚洲央行行长”。

银行业 五年蜕变

□本报记者 王妮娜 北京报道

从“技术上”濒临破产到今日跻身全球市值前三甲,中国国有银行“致富”的五年是银行业蜕变的真实写照。

2001年12月,当世界贸易组织向中国敞开大门时,一个体弱多病的金融体系步履蹒跚。而占据了金融业资产规模半壁江山的银行业,由于资本充足率严重不足,被国际社会描述为“濒临破产”。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要脱胎换骨就必须还金融机构以本来面目。银行是经营货币的企业,改革首当其冲需厘清财政与银行的关系,建立以出资额为限的有限责任机制;市场化需遵循企业内在的运行机制,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规范运营则需强化外部监管,建立独立于政府的第三方专业监管。

2003年4月28日,银监会悄然挂牌成立。也正是从这年开始,工行、中行、建行、交行等银行全面启动股份制改造并成功上市,在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绩效等方面不断与国际先进银行缩小差距。国有商业银行从五年

前技术上濒临破产,蜕变为具有一定国际认知度的大型商业银行。与此同时,农村信用社通过产权改革、补充资本、转换机制实现再造。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谈到这场气势如虹的改革时总结说:“整个银行业改革呈现出两头带中间、全面上台阶的生动局面。”

曾经被国际社会视为“地雷阵”的中国银行业成功地实现了入世来的第一次华丽“转身”,形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中、建、交四家改制银行平均不良贷款率2.87%、资产回报率1.11%、资本回报率16.38%。按照2007年12月末市值计算,工行、建行、中行跻身全球银行前三甲,按照2006年底全球银行一级资本排名,工行和中行也进入了前十名,我国银行的评级得到了大幅提升,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地位和影响力今非昔比。

与此同时,银行业的安全稳健性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截至2007年12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从2002年末的23.7万亿元增加到52.6万亿元,翻了一番多。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从2002年末的23.6%下降到6.7%;本年

利润从2002年底的364亿元,增加到2987亿元(税前未经审计);风险拨备缺口从2002年末的1.34万亿元压缩到5353亿元;资本充足率达标银行从2003年末的8家增加到2007年9月末的136家,达标银行资产占比相应从0.6%上升到78.9%。

市场取向的金融体制建设和商业取向的金融机构企业化改造必须齐头并进。2006年底,中国银行业告别五年过渡期,按国际规则进行金融体系的运行,微观上给外国资本以国民待遇,允许其进入金融业。目前,外资银行在华发展的市场格局实现了由“分行主导”向“法人主导”平稳过渡,已有21家外国银行将在华分行改制为法人银行;宏观上,利率、汇率市场化,并按国际标准如巴塞尔协议、IMF公司治理准则等监管金融企业。

伴随着市场化一路引吭高歌的还有国内银行业的国际化。中资银行“走出去”别开生面,到2007年末,共有5家中资银行控股、参股9家外资金融机构,有7家中资银行在海外设立60家分支机构,海外总资产达2674亿美元。

刘明康 执著的文化使者



□本报记者 王妮娜 北京报道

身为中国的“首席风险官”,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记者眼中是一个执著的文化使者。在铁腕监管的背后,他倡导国际银行管理的先进理念,将信贷文化和公司治理文化视为银行强健之本。

2003年银监会成立,刘明康可谓

“白手起家”。时值外资银行“兵临城下”,国内银行不良贷款率高居不下。中国银行业的理念、机制和体制亟待改革,如何确立符合中国国情的银行业监管框架是刘明康面临的最大挑战。

得益于在银行领域的长期实战经验和对国际银行业的深刻洞察,银监会成立不久,刘明康就推动确立了“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提高透明度”的科学监管理念,以及“准确分类—充足拨备—做实利润—资本充足率达标”的持续监管思路,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实施风险管理为本的审慎监管。

强化资本监管是刘明康布局中国银行业监管格局的重要理念。银监会成立后,建立了严格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制度。在参考国际银行业俱乐部“行为准则”新巴塞尔协议同时,刘明康很注重采取中西合璧的战略。结合我国银行业实际国情,银监会发布了实施新资本协议的有关指导意见,明确了我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的政策框架、基本目标、原则、范围、方法和时间表,推进主要商业银行有序实施新资本协议;与此同时,贷款五级分类、CAMELs(骆驼)监管评级、风险集中度

监测等一系列国际通行的审慎监管办法同步推进,运用了贷款偏离度检查、贷款迁徙分析和同质同类比较等国际通行的监管手段。

在一系列技术手段的背后,刘明康认为,要从根本上提高银行风险管理水平,必须积极培育和建立良好的银行信贷文化。在他看来,除了制度的约束,借贷双方需要在信贷决策过程中建立一种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的伙伴关系,遵守一些最基本的社会行为准则。

中国银行业只有通过改革和开放才能闯出一条自强之路。早年留学英国的刘明康深谙,良好的公司治理文化对于国内银行改革的重要性。通过推动境外战略投资者入股,推动银行机制和体制变革,是刘明康履新五年来矢志不渝的信念。2006年,国内学界掀起了一场针对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大讨论,记者至今仍记得刘明康在那年两会期间列席政协民建组座谈时的感言。当时年届60的他说,中国的金融业改革任重道远,将来有一天自己退休了,相信会不断涌现出后续者,仍然坚定不移地推进这场改革。

保险业 五年实现新跨越

□本报记者 石朝格 北京报道

“十六大”以来的5年,年轻的中国保险业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绘就了一幅完美的发展蓝图。

“2002年左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保监局架子还没有搭建起来,保险业的竞争几乎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甚至可以说是‘自生自灭’,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好的发展前景。”某保险公司的一位高管至今还记得,当时刚归国加盟一家保险公司的他看到此情景甚至萌生了去意。

他没想到的是,经过短短几年时间,他所在的那家保险公司在海内外上市了。他说,“国外先进保险公司拥有的制度,我们也有,国内整个保险业的大环境也跟上了。”

18.2%的增长速度、保费收入在世界排名第九、总资产2.9万亿元……这些数字道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以防范风险为生命线的中国保险业站在了新的起点。

2002年11月,国家对保险业提出了“改革要有新突破”的要求,明确要加快推进国有保险公司股份制改革的进程。这对当时仍靠传统的保费规模取胜的保险业而言是一盏“明灯”。中央财经大学保险系主任郝演苏回忆说,当时保险业面临着资本金短

缺、偿付能力不足、不良资产难以消化的困境。

此后几年间,保险法修改,车险、航意险实行条款与费率市场化,三大国有保险公司相继完成股改并上市,保险中介及代理人制度酝酿变革……这表明保险业的发展模式已由传统的“保费规模扩张型”向“效益优先型”转变。

2006年,保险业“国十条”、《保险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相继出台,交强险制度推出,重疾标准定义公布,营销员税负减轻。这些政策措施勾画出保险业日益清晰的监管发展轨迹。

特别是“国十条”的颁布,使得保险业的定位更加明确:保险具有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的功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是金融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

此外,通过改制上市、增资扩股、发行次级债和引入外资,保险公司不但补充了资本金,提高了偿付能力,存量风险特别是历史遗留的利差损风险逐步化解;通过加强寿险预定利率管理、规范车险业务、严格资金运用监管等措施,保险公司的增量风险也得到有效控制。

提及过往,中国保监会主席吴定

富在今年召开的“全保会”上指出,5年来,中国保险业初步探索出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即“一个根本,以人为本;提高两个能力,科学发展的能力和和服务和谐社会建设的能力;发挥三大功能,经济补偿功能、资金融通功能和社会管理功能;处理好四个关系,加快发展与防范风险的关系、市场机制与政府推动的关系、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推进创新与加强监管的关系”。

5年来,保险业总资产规模超过2万亿元,正向3万亿元迈进;市场主体不断增加,对外开放稳步推进。截至2007年底,我国共有保险公司110家,比2002年增加68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9家,保险专业中介机构2331家;国际地位稳步提升,有6家保险公司在境内外上市,多家公司实现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者,有15个国家和地区的43家外资保险公司在华设立134个营业机构;市场体系日臻完善,偿付能力监管、市场行为监管和公司治理结构监管“三位一体”的保险监管体系开始形成。

尽管较之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在整个金融业中所占的份额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可以预见,今后保险业发展前景依然诱人,将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

吴定富 铁腕监管者



□本报记者 石朝格 北京报道

最近一次见到中国保监会主席吴定富,是在今年2月15日召开的第二次抗灾救灾工作视频会议上。身着黑色西服的他,尽管看上去有些疲惫,但这丝毫不会“冲淡”他作为铁腕监管者的本色。

简短地介绍了前一阶段保险业抗灾救灾基本情况之后,吴定富话锋一转,直指要害:“我在2月1日下午的电视电话会议上要求各家保险公司每天在5点之前报数据,春节期间我一直在办公室,每天都要求办公厅把数据给我看,有的公司头天报的数据比前天报的数据还要少,自己和自己都很矛盾,建立巨灾保险制度迫在眉睫。”

我不知道这个数据是怎么报出来的。”

在座的一家保险公司高管低声向记者说:“主席又脱稿了,‘猛料’又有了解,赶紧记吧。”

坐在主席台上的吴定富表情异常严肃,一口气道出了四方面不足:很多保险公司的重点工作主要集中在业务发展上,而对重大灾害事故的应急处置重视不够,必须建立巨灾应急处理的长效机制;尽管保险业积极主动赔付,但保险赔款占灾害损失的比例仍然很低,与全球平均水平有较大差距;此次灾害暴露了部分公司“防重于赔”的灾害应对思路还没有真正树立起来,防灾防损能力亟待提高;风险管理体系不完善制约了保险业的巨灾承保能力,建立巨灾保险制度迫在眉睫。

2002年11月,外表和善的吴定富自担任中国保监会主席伊始,就让业界“领教”了他的铁腕作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先后走访了在京的各家保险公司,迅速地掌握了监管对象的第一手资料。

随后,国有保险公司改制方案获批、股份制保险公司上市进程加快等利好消息相继传来。

时至今日,“三个转变”,即以国有保险

公司股份制改造为基础实现组织形式的转变,以保险公司境内外上市为契机促进管理体制的转变,以巩固和发展改制上市成果为新起点推动经营机制的转变,都已变为现实。

6家保险公司在境内外上市;多家公司实现增资扩股、引入外资。

作为铁腕监管者的吴定富,也不乏温情的一面。在保监会召开的第二次抗灾救灾工作视频会议结束后,他满面笑容地向在场的保险公司高管和记者拱手:“给大家拜个晚年。”

会场上,对于围堵采访的记者,他也一改往日的低调,逢问必答……看到这一场景,工作人员忙上前来解围:“主席脚有病,有什么问题还是向袁力主席助理吧。”